

像人类历史曾经多次记载过的那样,我们正在进入寻找精神家园的世纪,无论愿意与否,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科学让细分和区分的思维方式接近无限,而对无限的想象和敬畏让人类回到精神,一种对存在的超越。

历史上解构人类社会精神性的最大因素,不是战争,而是资本加上积累的心态。后者是资本的最好土壤。这两者共同行动,最大限度地、为生命建构各种鸟笼,把创造性物质化、具象化,生命的灵感被消解在填写之中:时间、空间、忙碌、满足、期待、焦虑。科学与人文研究具有同样的危险,如果研究仅仅处于或满足于资本积累状态的话。这就是跨文化研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金丝燕教授

此次国际讨论会涉及的问题之一是,跨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学科”,它的定义与方法。这里,该“学科”的研究关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文化与人类学是否并置的问题,也不是民族国家解体与否的论题,而是文学领域、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跨文化性,包括文化接受中的夸张性,身份及其异变性问题。

### 一、跨文化研究:问题的提出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复兴时代,文化、族群、人类学、宗教的身份及其多

样性的复兴。20 世纪下半叶,世界一体化进程、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概念的解构、不同文化群体的密切交往和移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分界线受到冲击并变得模糊起来。在世界层面上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即文化身份市场的大爆炸。历史上的人们从未如此热衷于文化、族群、人类学、宗教等的身份问题与多样性的思考。跨文化性和跨文化研究论题随之产生。我们在各学科的研究中基本上都能看到这种跨文化性。

多元文化、文化间与跨文化通常会被相提并论。这三个当代社会的关键词确实有共同的背景,但视域、期待、方法都不同。

多元文化性的重点在于不同文化与想象在同一空间的并存、共在、并置。它具有渐进性,可以是一个进程。

文化间性探讨“之间”的关系。一种重视多样性、视角为平行移动的研究方法。它可以促进各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今天,经过六十多年的讨论,从文化间到“文化文本间”,“间”成为人们讨论文化、文学、政治、社会学、语言学研究角度的关键字。“文化文本间”是克里斯蒂娃在阐述巴特金文学批评时伸延出来的思考维度。在文学创作的空间里,文化改变着来自其他文化的作品,而后者也反过来改变这一文化。这一“间”(inter)的文化文本概念自提出后得到普遍认同,尤其在文学界。文化间性与文本间性促进相互审视、定义、重读。在这一基础上一些新的概念随之产生,如宏观国际符号学角度的文本阅读、时空模式的交融性,文学艺术作品素材的广泛性、文学艺术创造与当代文化流动性的关系等。

跨文化。从词源的意义上看,跨“trans”来自拉丁语,动词,意思是“以外”,“在那边”,指生存以外,即离开当下状态的“越”。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中文用“跨”来翻译“trans”是否合适?“跨”指一个移动的行为,从这里到那里移动,平面维度。而拉丁语的“trans”由当下的状态解脱、往“那边”变动,其维度可以是想象的、超验的,因此有形而上的意义。“超越”可能比“跨越”更接近本义。但这里,我们仍沿用原来的“翻译”。

跨文化研究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与生存有关的、超越知识理论的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它是哪一层面的活动?想象的?行为上的?都不是。分裂的知识碎片没有办法使人接近真正的认知,即便用上先进的计算机进行加減。必须创造超越碎片的灵感。否则数字和资料仅仅堆积而已,一如骨头、肌肉、皮毛的搭积木。“跨”是一种形而上。人类的思想、活动、研究,人类的生命,在“跨”的时候产生飞跃和不可思议。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显示。跨文化研究容易与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

总体文学相提并论,并被视为边缘地带的、跨学科的尝试。习惯于学科分界的研究者视其为似是而非。但也有学者提出原有学科体制是否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跨文化研究或注重多种文化的共同特征,或探讨各文化体系自己无法单独突显出来的潜在性。

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有三。一是探讨跨文化性。跨文化性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文化族群“放眼”的能力,跨越自身和他者等同对比的能力。对他者的审视与自身的自视,成为一条通往自身意识的道路。其次,跨文化研究提出的是主流文化与被主流文化控制的、或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问题,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今天,文化的多样化对于具有个体与社会双重身份的人来说变成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跨文化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是揭示存在于文本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探讨各文化间的可能的联系、对抗、相关性、交流和互动。因此,跨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在文化的相异性。

培根 1620 年在谈到科学现代性的起源时,把人的雄心分成三等:私人的目标,为祖国政治服务的目标,人致力于重新建设人类王国并降至推进到宇宙的雄心。18 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区分成为认识论的特点。在知识的层面,这是现代意义上学科产生的时代。作为对分科知识极度发展的反弹,紧接而来的是追求重新找到整体性和真实性。于是跨学科的思路和努力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德国产生,如歌德、德国浪漫派、斯莱格尔兄弟和诺瓦里斯这些非主流派。他们将整体性作为中心议题,去接近真实,主张不排斥任何东西,注重考察他者。在他们看来,他者是理性的反面。他者代表了另一种文明。这些文学家和思想家将感性的存在、非理性的价值与理性的霸权相对立。他们试图在存在的不同层次上建立联系。他们是我们跨学科研究的前辈。

19 世纪末的三大因素——革命精神、社会乌托邦和科学主义——的会合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20 世纪的乌托邦大实践和民族国家形态下的科学性的大一统。由此产生的现代性有两个特性:统一的价值尺度和科学化思维作为知识的模本。把学科知识变成科学性和真实的唯一条件是两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个主流。然而,有另一种倾向或隐或现地与 19 世纪科学主义思维模式相对,那就是在各学科之间进行的对话,希望以此寻找认知的各个层面之间、认知行为的各种方式之间的关联。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知识爆炸与细化所引起的“超越”运动。

跨文化是多重的维度,同时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它既是穿越世纪、穿越历史文化长河的一段流程,又是特定的时间内穿越不同文化的水流。它使各文化

不同想象之间获得一种系数,一种同时带有回归、互动、向上特性的系数。或者可以用空间性和关联性来定义跨文化性,各文化及其想象在这一开放和互动的关联中被相互制约、触动、感染、变形。跨文化性“la transculturalité”指的是超越各文化,而非处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围绕思考的人这一核心,跨文化研究要避免的是自觉不自觉地给各种文化定位立等级。各不同文化从本体的意义上具有完全的平等性。“跨”的意义在于不进行平行对比,而是从异同出发进行总体把握和思考,有关文化的异同不是研究的结果,相反是研究和思考的开始。因此,认为跨文化性与民族意识相对立的观点偏于形而下。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研究中这“跨”的行为最基本的要素呢?

## 二、跨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的基本要素

跨文化研究学科建设有四个要素:跨文化理论、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和跨文化方法。而跨文化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是难点。

### 要素一:理论建设

中外研究者有很强的理论建设意识。中国不少学科项目和学术会议将跨文化研究作为关键词。由科学院外文所周启超和郭宏安研究员共同主持,于2001年立项的院级A类重大课题“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理论诗学与比较诗学两个平台联动,探索现代文学理论的发育和流变与不同文化境域的作用。该项目的研究提出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世界整体文化”操作平台、消除“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在文化视界上的盲区、多种文化圈和多样的诗学体系的论题。<sup>①</sup>2004年12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第二届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会议中,有学者提出了“西方跨文化研究中的‘洋葱’理论”<sup>②</sup>。

由乐黛云、李比雄主编的《跨文化对话》是中国最早以跨文化为丛刊标题、以跨文化研究为方向的杂志。自1996年南京会议酝酿、1998年创刊以来,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丛刊两条线同时展开,一是理论探索或学理研究,二是社会与社会的对话,一种行动和实践。

<sup>①</sup> 周启超主编,《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200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sup>②</sup> 王桂彩、陈村富,《国际跨文化研究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ic),该文对跨文化研究的国际背景与现状作了介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6卷,第4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前沿性问题和理论研究课题组”,pp. 6—9。《浙江大学学报》从2003年开始即组织了“跨文化研究”栏目,如程竺,《走向第二轴心时代的跨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4(6),pp. 32—39。作者认为,宗教研究是跨文化研究的原动力:“在宗教的跨文化研究的影响与带动下,出现了跨文化的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乃至教育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p. 6)

由法国国家博士、人类学家李比雄(Alain Le Pichon)1988年创办的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是欧洲最早的跨文化研究中心,也是欧洲最早与中国开展跨文化对话研究与实践合作的研究机构,与乐黛云、钱林森共同创办了《跨文化对话》丛刊。其跨文化眼光与具体的实践,对该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利大英(Gregory Lee)2005年创办跨文本跨文化研究院,并在次年创办《跨文本跨文化》杂志。在创刊号编者按里,主编利大英强调该杂志的特点是跨越现存的学科体制、尝试乌托邦式的英法中三语性。在编委会中入选诗人,以“避免落入对社会文化现实的浮浅批评”。该杂志在作者的文化身份、写作语言与理论思考方面大胆地实践了跨文化性。

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是什么呢?与神学和近世以来的理论体系不同,它的特性是超越的、形而上的,不架构的。如果从约定俗成的期待习惯出发去论寻求或建设其理论,结果很可能是失望。

### 要素二:跨文化资源

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跨文化研究是两个或更多的社会间的比较,也称泛文化比较。狭义上,跨文化分析是一个‘全面文化’的方法——包括10个或更多的世界范围社会的系统比较”。我们认为跨文化的“跨”字不能简单地与横向覆盖等同。人类历史是一个跨文化的织锦。跨文化的关注就在这织锦上。它构成了极为丰富但难以把握的跨文化资源。

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不在收集和积累相似现象并进行比较,而是从各文化的差异点出发研究人类的文化模式,生存、思维、语言、行为、交流、视角等,出发点可以无数,但终点无法界定。

### 要素三:跨文化经验

跨文化经验涉及文化的普世与特殊的关系。普世价值与是否要保留文化的基因是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跨文化实践的原则是:各文化中原有共同的生存理念,各文化特有的理念也有普世价值,如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所探讨的跨文化经验有启发意义。该中心以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为依托,比较中外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研究中外经济合作中出现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该中心负责人郑立华的法文专著《巴黎中国人及其面子策略》、《语言与社会互动》展开了对跨文化经验的研究。

由乐黛云、金丝燕主编的中法文本的《远近》丛书,是跨文化对话的一个尝试。丛书邀请中法两位作者围绕同一主题分头写作合集出版。两位作者在作品

出版后于书中相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所处的文化与个人的经历,从各自的人生阅历和文化中汲取营养,从哲学家、作家和诗人那里获得灵感。写作各方经由别文化迂回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己方文化,同时,这也推动了中法跨文化交流,当然,理解与误解同样不可避免,不但不可怕,且是研究很好的素材。法国瑞士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是丛书的支持者和资助者,嘉特琳·盖尔尼耶与米歇尔·苏盖分别负责文化间项目和出版社工作。他们这样论述远近丛书的意义: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在中法两国国内,“远近”跨文化交流的尝试也是有意义的。丛书别致的风格和内容能够给双方带来惊喜和奇趣,同时又能向对方国家介绍本国文化。如此一来,丛书既不会在己方同胞眼中显得浮浅乏味,也不会成为对方国家读者手中枯燥的教科书,而是一次作家本人向远在天涯的异国人或是近在比邻的本国人讲述自己和本国故事的机会。<sup>①</sup>

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安妮·居里安 2002 年创办的“两仪文舍”,是跨文化实验性文学活动的生动尝试。该文学实验室定期邀请中法作家各一位,围绕同一主题分别写一篇作品,题材为或小说或诗歌。作品由两人分别用各自的母语翻译。然后开讨论会,作家与翻译展开对话。跨国度的创作与文学批评并行。

由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欧洲华人学会等创办的双年中欧论坛是建设公共空间与跨文化认知的巨大试验地,世界治理的生动实践。2005 年在南沙举行第一届论坛。2007 年第二届论坛在欧洲 9 个国家 22 个城市,同时举行 46 个分论坛,之后在比利时的首都,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的布鲁塞尔举行大会的总论坛。这是一次民间的中国和欧洲社会之间的对话,旨在加强中国和欧盟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沟通和共识,以迎接全球化时代世界面临的一些共同的挑战:生态、经济、教育方面,还有科技发展的方向等。46 个分论坛,其中 19 个是按职业分类的,27 个按照主题分组。论坛总监于硕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说:

如此大幅度跨界(地域、时差、历史、领域、阶层、国度、文化、意向……)的论坛,是一次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上演,既是一次动员、整合的机会,也是一个危机场合(阈限)。原有的结构不再稳定,原有的“我们”趋向“他者”,原

<sup>①</sup> 见乐黛云、金丝燕主编,《编年史:中欧跨文化对话(1988—2003)——建设一个多样而协力的世界》,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对话平台:思想与方法/新思想文库”,张琰、高振华译,2008 年,第 43 页。

有的标准出现混乱,原有的资本需要整合,原有的权力失效……大家面临巨大的知识、思想和存在本身的挑战。《中欧论坛:一次人类探险》

2008 年 9 月 25 日到 27 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跨文化十周年讨论会上,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默作了题为《跨文化对话实践》的发言,对中欧论坛的跨文化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展望。<sup>①</sup>

#### 要素四:方法

方法是灵魂。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是什么呢?它与现有的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有什么重合与不同呢?我们看到研究者或论者将其与文化间并用、换用。而互识、多元和跨文化是三个概念。互识是从认知模式/语言/他者的眼光这样的镜子里看自己;多元是多棱镜;跨文化则已脱开与镜子的关系。非镜非非镜。横向实证、纵向思考、整体研究<sup>②</sup>三大方法可以通用。哈佛学者张光直的研究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尽管他并没有以跨文化研究命名自己的方法。乐黛云《跨文化之桥》一书对其代表中国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作了深刻总结。

法国里昂大学利大英创办和领导的跨文本文化研究所代表的欧洲跨文化研究的大学模式:跨文化研究博士点(法国第一个)、出版社、杂志。<sup>③</sup>其研究视野直指跨文化性问题。其案例与文化整体板块撞击研究为跨文化对话方法提供了经验。

跨文化研究行动与思想并行的模式是人类学家李比雄创办和领导的欧洲第一家跨文化研究院。成立二十余年以来在李比雄提出的“互识”(connaissance réciproque)论题和跨文化研究的视野、资源、经验与方法上进行了长期探索。1995 年,《独角兽与龙》中文版、英文版由乐黛云、李比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类进步基金会出版部于 2003 年再版了法文版。该书记录了中国与欧洲跨文化研究合作最早的尝试。

中国进入国际跨文化平台的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模式是乐黛云与钱林森创办的《跨文化对话》丛刊。丛刊从一开始就定位在建设一个跨越现有学科体制,对

<sup>①</sup> 《跨文化对话》丛刊第 24 期全文刊载。

<sup>②</sup> 关于整体研究的方法,见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论著《艺术的规则——文学场的起源与结构》(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Points Essais, Seuil, 1992)。

<sup>③</sup> 利大英的跨文化观点和研究方法见其专著《中国与西方幽灵——诗性质疑、现代性与混血》(La Chine et le Spectre de l'Occident, contestation poétique, modernité et métissage), Trad. de l'anglais par éliane Utudjian Saint-André, Paris, Syllepse, 2002。

有关文化、文学、社会、人类的问题进行交叉、整体性思考的空间。2007年3月1日至2日跨文化对话杂志编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对《跨文化对话》杂志自创办以来的工作作了总结,决定进一步推动杂志的发展,建立跨文化对话的三个平台。

第一是跨文化对话丛书平台:“思想与方法”(Espace Dialogue Transculturel: Pensées et méthodes)。这是为国内外的各种新方法新思路设立交流的平台。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翻译出版法兰西公学教授首座讲演录。谁是我们时代的真正思想家?他们的方法与思想是如何融合的?该平台首先为中国学界和年轻人提供思想与方法的范本。该平台的第二项工作是建立“思想的对视:跨文化新人文书库”(Bibliothèque Inter-Regard des pensées),组织翻译介绍出版世界有影响力的当代论著。对象是博士、研究者。第三项工作是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建立“新思想书库”(Bibliothèque: nouvelles idées,翻译基金会书库部分著作),编辑、翻译、介绍出版最新资料、最新思考、世界范围内的新论题。乐黛云、金丝燕主编的《编年史:中欧跨文化对话(1988—2003)——建设一个多样而协力的世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苏盖所著《他者的智慧》(L'Intelligence de l'autre)<sup>①</sup>,无论从研究、编辑视角与资料的处理上都为跨文化学科教材的编写作了不同的尝试。苏盖的著作体现巴黎政治学院当今的培养方向:尽可能广的知识视角与适当的深度相结合。而编年史的编者在后记中阐述了该书编辑中所体现的跨文化性:

“此部编年史的编辑是跨文化对话研究在期待视野和文本阅读上的一次尝试。用史料开放式阐述的方法来书写历史。

此部编年史的特色有四:第一,有很好的资料完备性。历时十七年(1990—2007)的两千多份各种文本(工作记录、资料跟踪、项目规划、介绍、总结、调查研究报告、国际研讨会、专题文章、网络建设等)归结成七百多种文字记录而后进行摘录,再现中国网络与人类进步基金会长期合作的每一个进程。

第二,该编年史的语言方式是完全的原生态。所有文本摘录都保持当时的情形,展现参与者对“他者”的认知过程,为跨文化对话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第三,以历时性为主线,打开共时性的空间、汇集多层面视角。围绕同一事件,尽可能提供代表不同视角的文字记录、批评和思想。文本的互动性通过文本间、文本与读者、历史与当下、参与者各不同的视角四个层面展开。

第四,构建一个特殊的历史记录平台。这是一个对于读者和编者都比较特别的角度,阅读不再仅仅是接受行为了。让历史各个细节与读者对话,读者的阅

读不是被动地、被灌输式的。我们不能把咀嚼过的历史吐出来给读者去消费,也不想把控式地叙述历史。读者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

我们编辑的原则有二,不用单一的史学书写理论,无论新旧;不以编辑者个人的论断引领读者,不执意寻求耳目一新的结论。

我们的期待首先是要为跨文化研究找到史料阅读方法。尽量让史料说话。史料不是历史的碎片和沉积,史料是有生命的。其生命通过阅读在不同视野的对话、在文本的共时性中产生。”<sup>①</sup>

第二个平台是跨文化对话国际论坛。第一次论坛值《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之际,于2008年9月25日到27日在当年杂志的发源地南京大学召开了“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就跨文化研究的经验、资源、方法与理论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一平台的另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是与人类进步基金会共同于2007年、2008年夏季在印度和日本组织了第一届中印青年论坛与第二届中印日青年论坛。2009年夏季将在中国组织第三届亚洲论坛。

第三个平台是加大加深《跨文化对话》丛刊的编辑出版。通过杂志推动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对话,为知识阶层、青年学生和对文化交流有着深切关注的读者提供一个特别的国际思考空间。

跨文化丛刊建立的三大平台是中国跨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一次尝试。

在二十余年的不断思考和实践后提出跨文化研究学科建设具有历史意义:整体性与精神性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倾向。我们的问题是:继续严格遵循19世纪的思维模式界定下的学科领域架构还是向我们的跨文化前辈们靠近?

本文为作者在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南京,2008年9月25日

<sup>①</sup> 苏盖:《他者的智慧》,刘娟娟、张怡、孙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sup>①</sup> 见乐黛云、金丝燕主编:《编年史:中欧跨文化对话(1988—2003)——建设一个多样而协力的世界》,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对话平台:思想与方法/新思想文库”,张琰、高振华译,2008年,第1—2页。